

搭建“知青部落” 相聚“第二故乡”

在奉贤区海湾镇,“农垦博物馆”和“知青招待所”静静地矗立在围垦而来的土地上,记录、展现上海人民的围垦历程。

博物馆内分“围垦造田”“青春年华”和“改革开放”三大部分,展示着上海农垦事业 50 年的发展脉络及知青们的工作、生活。比如,有上海市成立围垦指挥部的文件、名单,有围海造田、大坝合龙的照片,也有知青衣、食、住、行的场景再现,还有反映当年围垦全过程的纪录片。

顾彩英,是馆内的志愿讲解员。她曾遇到过许多照片上的人物或其家人回来探访。比

如,有张照片展示了知青陈介芳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劳动的场景,一次陈的父亲前来参观,看到照片感慨良久:“那时女儿对家里报喜不报忧,没想到过得那么苦。”还有一封饱含深情的手写家书,记录了黄山茶林场通电那激动人心的一刻。据称,家书后来还刊载在报刊上。

而在离博物馆不远处的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正举办“梅花节”,有人说,知青的人生轨迹,正与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品格不谋而合,“梅花节”正是对知青最好的注解。

知青招待所由当年农场的三幢两层楼房

改建而成,宿舍内的上下铺、食堂内的八仙桌和长条凳、墙上刷写的“广阔天地、大有作为”等标语,令不少知青仿佛回到当年。员工表示,招待所节假日常一房难求,许多知青带着儿孙远道而来,“看看爸妈当年战斗过的地方”。还有知青呼朋唤友来此聚会,重温农场岁月。

如今,“农垦博物馆”和“知青招待所”组成了一个距离市区 60 公里的“知青部落”。这里已成了知青相聚怀旧的重要载体,也是社会各界了解上海围垦历史及知青生活的重要窗口。

本报记者 金旻旻



▲ 农业连队挑灯夜战开沟挖渠
► 长江农场新婚知青在贴窗花



(上接 A9 版) 农活繁重 开河艰苦

工作倒是大同小异的,不外乎插秧、割稻、脱粒、种地、开河等。最辛苦的是每年两次“双抢”(抢收抢种),天不亮出门,天黑才回来,午饭也只能在田头吃,啃几个馒头了事。对此,上海知青有个形象的说法:“两个黑膀胱,一个急匆匆”。

碰上“猪谢还田”,每人都要下田撒猪粪。猪粪极臭,手上的味儿一星期都洗不掉。可再爱干净的姑娘,到饭点也只能在沟渠里洗洗手,抓起馒头就啃。水田里还有吸血的蚂蟥,女孩最怕这个,下田后惊叫声此起彼伏。“如果蚂蝗钻进腿里,只留尾巴在外面,千万不能拔,不然血可止不住。要拍,才能弹出来。”朱平说。

那时,知青的休假少得可怜,市郊农场每三四个月休一次,外地农场一年才能回趟家。放假那天,几百名知青从农场出来,像潮水般涌到码头、车站。当地人一看到这个情景,就晓得“知青放假了”。“就像现在,一到中午,静安寺就会出现许多白领,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当然,我们是黑颈。”陈春山说。若是遇上大雾、大风,长兴岛和崇明的轮渡就会停航,知青们只得痴痴守在轮渡口,等待雾散风停。

为了积攒假期,不少知青连星期天都不休息,常常连干十天半月。于是,一到下雨天,大家就像白捡一个休息日,奔走相告“外国礼拜天到了”。哪怕在室内搓搓草绳、开会学习,也是高兴的。

繁重的农活,只是到农场后的第一课,寒冬腊月开河,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开河时,每个连队承包几十米。河深大约五六米,从上到下要挖许多土方,因此长度上哪怕差 50 厘米,工作量也差许多。很多次,连队之间为了谁多开一点、谁少开一点而“寻相骂”,甚至打架。

开河的分工也很明确,男的挖泥,女的挑担。在刺骨的寒风中,男知青赤脚站在冰冷的河水里,女知青挑泥挑得肩膀磨出了血,这番场景不少人一生难以忘怀。挖完泥后,男知青会相帮挑泥,长长的扁担,女生在前男生在后,男生总会默默地将泥筐朝自己这头拉。踩着“哎哟呵,哎哟呵”的挑担号子,熟练的人脚步轻盈,腿笨的人满地乱飘,每天总要走几十个来回。

很多人就在那时落下了病根。天冷插秧,

有人穿高筒靴,有人却觉得太“小资”,赤脚下水,导致患上严重的关节炎,几十年后路也不能走。还有人,挑泥时不停加分量,最后腰板别住了,还有人得了腰椎间盘突出。

劳动强度大,工资却比上海低。第一年,农场学徒工资 18 元,第二年 24 元,其中 3% 优秀者为 27 元。直到数年后,才逐渐加到 30 元、33 元。而上海职工,从第二年起就是 36 元了。尽管如此,精打细算的上海知青省吃俭用,每个月还能存款或往家寄钱。

就这样,刚到农场的小知青,没有任何过渡期,就从稚嫩柔弱的学生,迅速转变为“战天斗地”的农场职工。

风雨交加 抢修秧棚

正当朱平和陈春山在适应环境、学干农活时,比他们早去的甘兰新,在一个偶然的机会,发现自己居然很能喝酒。

那是 4 月,郊区还很冷,水田里结着冰凌。一天晚上,狂风暴雨把毛竹片搭的秧棚掀翻了。娇嫩的秧苗裸露在外,时间久了就会枯死,这可是大事!

宿舍区的树上,用铅丝挂着一段废弃的铁轨,紧急情况就敲铁轨,“当当当”倒也洪亮。晚上 8 时,铁轨被敲响,知青们紧急集合抢修秧棚。甘兰新等小知青学着老职工,套上破棉袄,用绳子、电线甚至稻草在腰间一扎,下身穿着短裤,赤脚冲进了大雨中。

屋外夜色如墨,伸手不见五指。知青们对农村道路不熟悉,脚趾不会使力,抓不住泥土。短短 1.5 公里,知青们跟头连连,足足走了 2 小时。每个人都摔得浑身是泥,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到秧棚后,甘兰新的棉袄浸透了水,脸色发白,牙齿都在哆嗦。副连长忙从口袋中掏出一瓶 60 多度的“熊猫牌”白酒,咬开瓶盖递给他:“喝一口!”生平从没喝过酒,甘兰新惶恐地推开:“不会。”“还要不要命?”副连长不容分说,把瓶口凑了上来。

第一口下肚,他足足咳了五六分钟,脸涨得通红。再喝几口,却感到一股热气从身子里冒了出来,人渐渐回暖了。他把酒瓶还给副连长,对方愣住了:“一斤酒,你小子只给我剩 2 两?”他却一点没反应。

从此他的“海量”就传开了。许多年后,每

当应酬喝酒,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。

一根扁担 包容你我

大量知青的到来,不仅帮助农场发展了农业和工业,带动了交通、道路建设,还将许多城里的风俗、习惯带到了当地,从社会人文的角度推进了城乡一体化。不少农村姑娘的穿着、发型,都跟着女知青学,连谈恋爱的动作也效仿起城里人来——手挽手是“小三角”,搂着腰就是“大三角”。

露天电影就是一种娱乐,巡回放映队一来,三五成群的人就披着棉袄、拿着小板凳,涌到广场上,荧幕正面挤不下了,就坐到背后。此外,每个连队都有文化室,打乒乓、下棋、唱歌、跳交谊舞,业余生活丰富多彩。“一个连队几百号人,若要文艺汇演,一周内就能拉台戏,相声、跳舞、诗朗诵,水平都很高。”朱平回忆说。

虽然城乡融合是主流,但知青和当地人也有矛盾。二十出头的知青们,年轻气盛、不服管教,有自己的价值观,老农则言语生硬、不善沟通,双方一语不合就能吵起来。

陈春山还记得,到连队 2 年后,他升任排长。一天开河,他不慎把珍藏的桑木扁担挑断了。“扁担很讲究,既要软,又要有韧性。”心仪的农具坏了,他一整天闷闷不乐。连队仓库后,正巧有 20 多棵桑树,手下兄弟们商量着砍一棵,给他做根新扁担,他默许了。砍树、剥皮、打磨,新扁担连夜制成。

第二天早训时,连长暴跳如雷:“谁砍的树?罚款!”并责成仓库保管员朱山勇调查。朱山勇是当地人,做事特别负责,平时将仓库管得清清楚楚,知青们想多拿根铁锹都不行。得知他来调查,不少小知青立即拉下了脸。不料几天后,老朱悄悄地对陈春山说:“扁担的事,我知道是你们排干的。你们也是为了干活,罚款我代你们交了,这件事我包下了。”

这下,知青们大为感动,陈春山也感受到朴实的当地人对知青群体的包容和理解。后来,他当上了指导员,常用这件事来教育捣蛋的小知青,要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。

不懈努力 终于回家

金黄的麦浪在阳光下翻滚,咸咸的海风吹

上海农垦发展史

上海的农垦事业,是在围海造田、建设农场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,曾对上海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。

1954 年,江苏省在奉贤滨海地带投资围垦滩涂,建立了奉贤农场(奉贤划归上海后,改名五四农场),吹响了“向大海争地,向荒滩要粮”的号角。1960 年,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副食品供应短缺,上海在近郊大规模围垦造田,建起一批副食品生产供应基地。

50 多年来,上海共组织围垦 62 次,围筑大堤 252.8 公里,总土方量 3300 万立方米,参加围垦的有 379853 人次,共围垦土地 822738 亩。在此基础上,市郊 18 个国营农场建立,分布在崇明岛、南汇县、奉贤县、宝山县、长兴岛、江苏省大丰县、安徽省歙县和黄山市太平县,奠定了农垦事业发展的基础。

1968 年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泽东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指示。在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间,上海共 41.8 万名知青作为“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队员”,来到国营农场。

从崇明岛到杭州湾,从黄海之滨到皖南山麓,知青和老围垦一起,为农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。长征农场首先实现扭亏为赢,黄山茶林场则建起了第一座水电站。

不仅农业获得突破,还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工农业结合的转型。一批知青参与创建的企业、品牌,如长江仪表厂、燎原三星蚊香等,成为当时同行业中的佼佼者,有些至今还存在。

经过几代农垦人艰苦创业,昔日滩涂变成了环境优美的新型城镇,农场职工生活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。上海农垦的知青经受着劳动和生活的磨炼,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。在农场孕育的友情和爱情,也凝聚成他们刻骨铭心、永志不忘的农垦情结。

通讯员 尚农 本报记者 金旻旻

不走对家的思念。1985 年的一天,甘兰新坐在高高的麦垛上,听到了一个消息: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,上海即将成立“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办公室”,要从农场抽调一些精兵强将。

那时,甘兰新已在农场待了 11 年。他在家中排行最小,俗称“奶末头儿子”。父亲是祖传第五代中医,“文革”时被批成“反动学术派”,60 多岁被送到金山消灭血吸虫。经此动荡,父亲希望子女不要走自己的路,“工农兵最吃香,到农村去也蛮好的”。所以,他去崇明农场,是打定主意待一辈子的。但那一刻,他的心活了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,在场部宣传科的陈春山,决定参加复旦新闻系自学考试。之前,他曾前往上海青年报实习了一年,却因户口问题没留下来。当时一起实习的年轻人中,有一位名叫强英,后来成了新民晚报的知名记者。他觉得,自己或许也能试试。

朱平则更坎坷。为了让儿子顶替回沪,原本在虹口区委工作的母亲千方百计换到了事业单位,却在 50 岁办退休时,被发现是“干部”而没退成。朱平只好留在农场,后来才通过读书、考试回到上海。那时,他在农场已待了 17 年,成了家,生了娃。

从 1970 年到 1989 年,根据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有关政策,共有 38.9 万名上海农垦知青职工,通过各种途径调回上海,继续在各条战线上奉献青春。

多年后,同属上海农垦系统下的三人,聚在一个办公室里,作为“老农垦”回望自己的知青生涯。不去评判时代的是非功过,单说那一段青春岁月,确是终生难忘的,单说那一段农场经历,也是受益匪浅的。简朴、宽容、正派、上进、奉献、无私,这些知青岁月赋予他们的宝贵品格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自的工作、学习、家庭,直至走到今天。

朱平的儿子在农场长到 10 岁,回忆起孩提时代,他只记得一个细节——每次回家,爸爸都要牵着他,在马家港码头上一路小跑赶轮渡。那时,年幼的儿子常问:“爸爸,我们为啥要跑?”

朱平也回答不上来。他只知道,哪怕前方是未知的大风或迷雾,哪怕不知停航的客轮何时启程,他也不能停下脚步。因为,只有和时代一同奔跑,才会见到希望的曙光。